

後全球化時代我國國防及產經發展策略淺析

My country's National Defense and Industr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the Post-Globalization Era

鄧翔靖 先生

提要：

- 一、全球化的貿易歷史顯示，經濟互賴係建立在制度規則與權力制衡上，才能降低戰爭風險；一旦互賴缺乏對等與約束，將淪為強權施壓工具，且透過制裁、封鎖操控局勢，侵蝕和平的基礎。
- 二、全球化的重組已讓亞洲供應鏈首當其衝，美、「中」對抗則加劇地緣風險，讓東南亞在製造轉移與關稅壓力間擺盪。我國雖有半導體產業優勢，卻無法進入多邊經貿框架，唯有深化與美、日、歐合作，藉海外布局形成產業聯盟，才能分散經濟風險。
- 三、面對去全球化與地緣對抗升溫，我國除應推動「多邊嵌入」戰略，讓更多國家參與關鍵產業投資，形成共同體，提高中共對我國動武的成本；更應發展「軍貿共構戰略」，將科技、產能與制度優勢嵌入民主盟國軍事體系中，才能提升國家的戰略地位。
- 四、國軍肩負衛國重任，必須確保關鍵航線暢通、保障軍工設施運作，並遲滯敵軍行動以爭取外援；面對全球風險遽升之際，唯有明確任務分工與建立持久戰力，方能維繫國家安全與國防自主。

關鍵字：全球化、供應鏈、地緣經濟化、軍貿共構

Abstract

1. Globalization's history shows that only institutionalized and balanced interdependence reduces war risk; without it, trade becomes a tool of coercion through sanctions and blockades.
2. As globalization fractures, Asia's supply chains face rising U.S.–China tensions. Taiwan, though strong in semiconductors, remains outside multilateral frameworks and must deepen U.S.–Japan–EU cooperation to diversify risks.
3. Taiwan should pursue a "multilateral embedding strategy" to bind major powers into its key industries and a "defense-trade co-construction strat-

egy” to integrate its tech and production capacity into allied defense systems, raising the cost of aggression.

4. The military must secure sea lanes, protect defense facilities, and sustain endurance to enable allied support-only lasting readiness ensures Taiwan’s security and autonomy.

Keywords: globalization, supply chain, geo-economics, military-trade co-construction

壹、前言

2025年1月川普(Donald J. Trump)總統重返白宮執政，並推行高額關稅(Tariffs)與單邊貿易政策以來，「全球化體系」(globalization)的退潮已成為無可迴避的事實；其上任迄今的各項措施，不僅代表美國全面脫離多邊框架，也加速全球國家彼此間的經濟脫鉤，使得國際貿易長期以來做為「和平橋樑」的功能逐漸瓦解。回顧近代史，「全球化」¹一度被視為促進繁榮與降低戰爭風險的重要機制；然而，隨著科技封鎖、能源要脅與地緣對抗愈演愈烈，經濟合作逐漸轉變為地緣戰略博弈的工具，當前全球化正面臨結構性的崩裂與重新組合，其後果勢必將改變世界權力版圖與既有的安全秩序。

美國學者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和約瑟夫·奈伊(Joseph S. Nye)兩人在1977年提出「複雜互賴」(Complex

Interdependence)理論時指出，經濟連結唯有在制度與力量制衡下，方能發揮抑制衝突的作用；若缺乏規範與對等的互賴關係，反而可能被轉化為制裁、封鎖或能源勒索的手段。²歷史也證明，經濟繁榮從未真正消弭戰爭風險，和平必須奠基於經貿與軍事的雙重支撐；因此，基於此概念認知，本文探討全球化裂解後，對我國國安環境的影響，並進一步說明政府可透過多邊產業嵌入與軍事貿易共構戰略，將科技與經濟優勢轉化為國家安全籌碼。由於國防戰略必須具備對產業趨勢的敏銳判斷，方能在不確定的國際局勢中，維持自主與長治久安；另方面，期許各界在產業與國防交織的新局中，共同達成國家韌性發展與長久和平的理想目標，這也是撰文的主要目的。

貳、全球化與霸權更迭的歷史

近代交通運輸與工業革命，澆灌全球

註1：「全球化」(globalization)定義為：世界不同地域之間社會關係的強化，致使相距遙遠的不同地域發生的事件，進而對彼此造成影響。黃宏吉，〈全球化的現況：學理與歷史的論證〉，臺灣智庫，2025年2月14日，<https://tier.psee.io/8cbjuy>，檢索日期：2025年11月14日。

註2：Robert O. Keohane &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Glenview, IL: Scott, Foresman, Second Edition, 1989), pp.24~29。

化生長的土壤；但全球化並不是一段線性發展的歷史，而是一場場經濟利益、制度設計與軍事角力交織的權力更迭。從帝國時代的殖民商路，到戰後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再到當代多極挑戰與地緣經濟化，每一階段都塑造出全球化不同的樣貌與風險結構。全球化更迭情形，摘陳如後：

一、從帝國商路到戰爭裂解(1870-1945)

(一) 炮火掩護下的國際貿易

十九世紀，歐洲列強開啟第一次全球化浪潮，遠洋航運推動原料與工業製品的跨境流通，並以軍事擴張強行開啟亞、非市場；³當時國際秩序僅依列強間脆弱的勢力平衡維繫，直至英國在1815年的「拿破崙戰爭」(Napoleonic Wars)⁴勝出後，確立其獨強地位。其後，皇家海軍奉行「兩強標準」(Two-Power Standard)，要求艦隊規模及軍力(指火砲)必須超越全球第二與第三大海軍之總和，⁵此舉旨在護持英國貿易利益，而非維繫世界和平，也奠定「日不落帝國」的霸權格局。

(二) 霸權式微後的列強併起

1. 進入二十世紀後，英國的海上霸權逐漸受到挑戰。隨著新興強權積極擴張艦

隊，全球海軍格局迅速改變，德國開始大舉造艦，美國、法國也積極推動現代化，日本則在東亞崛起；相較之下，英國雖保有一定優勢，卻已失去壓倒性領先。隨著英國海權的式微，削弱帝國的貿易防護網，最終助長大國間資源與市場的掠奪，並成為「一戰」爆發的重要結構性背景。

2. 「一戰」結束後，歐洲強權間的矛盾並未消弭，且由於英國國力下滑，使全球資源競逐更為激烈；當1930年代美國引發的全球「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促使各國祭起高關稅與貿易壁壘，經濟困境迅速發酵為極端政治與民族主義，進而推動軍事擴張。這段歷史凸顯出若缺乏制度規範與力量制衡，經濟網絡將難以約束衝突；於是在經濟危機、貿易保護與軍事競賽因素相互交織下，最終導致「二戰」爆發。

二、「二戰」前後的國際經貿體制(1945-1989)

(一) 保護主義點燃「二戰」戰火

兩次的世界大戰前後，保護主義與貿易壁壘皆大行其道，1930年代全球經濟大蕭條，導致各國紛紛採取「以鄰為壑」的政策，典型如美國實施的「斯姆特－霍利

註3：韓青、高先民、張愷華編著，《貿易戰爭：500年全球貿易進化史》(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7月29日)，頁92~96。

註4：〈拿破崙戰爭〉，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8B%BF%E7%A0%B4%E5%B4%99%E6%88%B0%E7%88%AD>，檢索日期：2025年11月12日。

註5：黃宇翔，〈英國海軍全球爭霸史〉，《亞洲週刊》(香港)，2019年1月28日，<https://tier.psee.io/8ayvyw>，檢索日期：2025年11月11日。

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造成全球貿易量急遽萎縮；⁶尤其「經濟民族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成為對自由市場制度、導致社會與經濟混亂後的必然反應。此時，各國開始轉向控制經濟、追求自給自足，成為搭建極端民族主義與武力對抗的溫床。⁷

(二) 戰後經濟秩序的重建

「二戰」末期，美國開始主導全球經濟秩序，試圖建立具規則性的多邊體系。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確立「美元」(US. Dollar)與「黃金」(Gold)掛鉤的匯率制度，同時建立「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以支援各國重建與金融穩定。1947年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以下簡稱GATT)，更進一步開啟各國削減貿易障礙的談判進程，同時鼓勵各國以談判取代「貿易戰」。

(三) 冷戰時期的局部全球化

「二戰」之後，美、蘇強權間的「冷戰」隨即登場，並將世界分裂為資本與共產主義兩大陣營，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市場

並未出現，現實是資本主義陣營內的貿易蓬勃發展，「歐洲共同市場」(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與日本出口導向型經濟快速崛起；而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則孤懸於全球市場之外。這個看似兩極的世界，其實是奠基於美國霸權的維持與制度規則的建立，形成一種對抗中的「局部全球化」架構。

三、全球化黃金期與單極體制(1990-2008)

(一) 後冷戰時期的全球貿易

1991年，蘇聯解體象徵「冷戰」落幕，全球邁入真正的單一經濟體系，原本被排除於資本主義市場外的東歐、中亞與中國大陸等地區，開始進入到國際貿易體系中。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WTO)取代GATT成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全球貿易機構，並推動農產品、服務貿易與智慧財產權等更深層的經貿整合，⁸連帶讓全球貿易快速攀升，由1990年的630億美元，增加至2022年的24兆230億美元(折合新臺幣約720兆，如圖一)。

(二) 全球化的黃金時期

「冷戰」之後，全球化涵蓋範圍與深

註6：〈美國貿易協定及關稅談判授權制度簡史〉，焦點事件，<https://eventsinfocus.org/issues/364>，檢索日期：2025年11月16日。

註7：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 (Boston: Beacon Press, March 2001), pp.310~311。

註8：〈多邊貿易體系的歷史〉，WTO，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history_e/history_e.htm，檢索日期：2025年11月9日。

度進入快速增長期，跨國企業與全球供應鏈蔓延至各大洲。資本流動自由化、數位科技崛起，各國高唱「扁平化世界」的主旋律，⁹以中共、印度與東南亞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迅速成為全球製造基地，並貢獻高度成長動能。此階段的全球化，不僅被視為經濟效率的體現，更成為「和平紅利」(Peace dividend)¹⁰的象徵，各國在經貿相互依存下，對開啟戰端都存有更多的顧慮。

(三) 美國獨霸下的單極秩序

共產陣營隨「冷戰」結束而瓦解，更進一步穩固美國經濟與軍事的獨霸地位；此時，日本受到戰後憲法的制約，專注於國內工業、經濟的重建；歐洲則記取二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對於強化軍備缺乏有力的民意支持。當歐、日兩大經濟體不約而同將自身安危寄託於美國壓倒性的軍事力量上；此時，全球尚無明顯的挑戰者出線，美國等於在某種程度上複製英國的「兩強標準」，同時實現美國治世。

四、多極挑戰與地緣經濟化(2008-2024)

(一) 金融危機後的全球化反思

1990年代跨國資本流動與供應鏈整合

註9：辜樹人，〈扁平世界的發現者—佛里曼〉，《天下雜誌》(臺北市)，第333期，2005年10月15日，<https://www.cw.com.tw/article/5109638>，檢索日期：2025年11月6日。

註10：「和平紅利」指「冷戰」結束後，各國因軍費削減，而釋出更多的財政資源投入民生與發展。James Chen, “Peace Dividend: What It Is and How It Works” Investopedia, January 30, 2025, <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p/peace-dividend.asp?>，檢索日期：2025年12月12日。

註11：John Waldron, “Strategic Interdependence is Rewiring the Global Economy”，FINANCIAL TIMES, August 12, 2025, <https://www.ft.com/content/25ab5e71-6ae2-495b-bf06-6fd2f1cbb18a>，檢索日期：2025年11月12日。



圖一：1950~2023年全球貿易產值

資料來源：參考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 “Evolution of trade under the WTO : handy statistics”,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trade_evolution_e/evolution_trade_wto_e.htm，檢索日期：2025年11月8日，由作者翻譯製表。

，聯手推動經濟快速擴張，但2008年的「金融危機」(Financial crisis of 2007-2008)澈底暴露全球化體系脆弱的一面；美國市場泡沫透過複雜的金融系統迅速擴散，並蔓延成全球性災難。危機過後，各國並未放棄全球化，但對經濟互賴的疑慮逐漸浮現；此後，對全球化的討論中加入風險分散、戰略產業與政治穩定等因素，為後續「去風險化」(De-risking)與選擇性互賴的政策氛圍奠定基礎。¹¹

(二) 中共崛起的「戰略競爭」態勢

中共藉WTO之助，迅速融入全球體系，加上製造業快速擴張，旋即在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¹²此後，推出「一

帶一路」、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一步步打造以自身為核心的區域供應鏈與經濟框架。此態勢引導全球制度與秩序逐漸向「中方靠攏」，美國遂於2017年將其視為「積極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正式以「戰略競爭」(strategic competition)來定調雙方關係。¹³此發展顯示，經濟與戰略互賴正演變為一種「類冷戰」式的競合關係，促使供應鏈和制度布局出現「陣營化」現象。

(三) 共產主義陣營餘波盪漾

在中共崛起的同時，美國卻面臨財政壓力、政治分裂與長期海外部署等疲弊，促使內部開始反思其在國際上的角色與承諾的成本。在此背景下，「戰略收縮」(strategic retrenchment)反而成為主流；¹⁴2021年阿富汗撤軍便是指標性事件，凸顯美國回收外交與軍事資源的決心。美國在近期對「俄烏戰爭」與中東衝突中的有限度介入，更加劇國際對其不再擔任「世界警察」角色的疑慮。這種局勢下，各國遂開始增強地緣聯盟與多邊合作意識，

讓國際秩序的重構迅速浮上檯面。

回顧全球化發展，2008年的「金融危機」揭露全球化的結構性風險；而中共崛起與美國戰略收縮，則進一步動搖單極秩序的基礎；此後，經濟互賴等於和平的假設逐漸失效。2022年2月的「俄烏戰爭」導致歐洲能源體系崩解，顯示經濟無法凌駕於安全考量；至於中東的紅海航運危機，亦使物流成本急遽攀升，反映貿易損失不足以嚇阻地緣衝突的風險。這些局勢發展印證全球化裂解的時代已然來臨，後全球化世界正逐步走向以安全為優先的「地緣經濟化」(Geo-Economics)模式。¹⁵

參、全球化陣營的安全想像與其制度根基

美國經濟學家托馬斯·弗里曼(Thomas Friedman)在1990年代先後提出「黃金拱門理論」(The Golden Arches Theory)與「戴爾理論」(Dell theory)，主張國家若深度參與全球供應鏈，彼此將因經濟互賴而缺乏發動戰爭的誘因。¹⁶事實上，美國於「二戰」後積極成立國際金融、貿

註12：〈【國際財經】中國正式取代日本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鉅亨網，2010年8月7日，<https://news.cnnes.com/news/id/2573855>，檢索日期：2025年11月11日。

註13：Timothy R. Heath, “America’s New Security Strategy Reflects the Intensifying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RAND, December 27, 2017, <https://www.rand.org/pubs/commentary/2017/12/americas-new-security-strategy-reflects-the-intensifying.html>，檢索日期：2025年11月12日。

註14：Colin Dueck, “The Strategy of Retrenchment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April 13, 2015, <https://www.fpri.org/article/2015/04/the-strategy-of-retrenchment-and-its-consequences/>，檢索日期：2025年11月9日。

註15：地緣經濟的特徵包括，地理因素是地緣經濟的發展基本要素，同時以區域經濟集團化的方式表現。參考〈地緣經濟〉，MBA智庫·百科，2024年11月26日，<https://wiki.mbalib.com/zh-tw/%E5%9C%B0%E7%BC%98%E7%BB%8F%E6%B5%8E>，檢索日期：2025年11月3日。

易組織，不僅是為復甦經濟；另一方面，也藉制度化合作，將潛在對手拉進規則框架中，使其無須訴諸軍事來爭取利益。這些制度安排鞏固全球化陣營的信念，經濟互賴同時抑制衝突，商業邏輯即是戰略邏輯；然全球化內涵並非僅限於經濟制度，背後也涵蓋政治、安全與戰略等層面，這些面向的運作邏輯與結構性意涵，以及中共崛起後的全新局勢，分述如後：

一、確保貿易與和平的底層邏輯

(一)全球化的歷史脈絡中，存在軍事與貿易秩序的密切關聯性。「一戰」前，英國維持「兩強標準」讓列強不敢妄動，歐陸之外，至少沒人敢染指英國的海上利益；換言之，其自由貿易是在砲火掩護下進行的。¹⁷以英國「馬首是瞻」的全球局勢，在「一戰」前夕才扭轉過來，英、美先後成為世界霸主，但在兩次世界大戰發生初期，他們都選擇一定程度的觀望，也在確保有自衛能力的同時，卻沒有實力能壓倒敵對陣營，反而造成戰局的延長。

(二)「冷戰」後，全球是一個兩極世界，但經濟卻是西方陣營的獨腳戲；且由於蘇聯經濟的欲振乏力，間接造成共產陣

營的瓦解。美國在兩次「波灣戰爭」(Gulf War)中確定其全球霸主的地位，美媒《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在1992年3月披露的國防部政策文件中就指出：「蘇聯解體後，美國應該防止任何國家崛起壯大到足以挑戰美國的地位，同時也致力於說服潛在競爭對手相信，不必為保護自己的正當利益，而追逐成為更強大的角色或凝聚更浩大的聲勢。」¹⁸，完全凸顯其俾睨全球之態度。

(三)經濟全球化雖帶來前所未有的繁榮，但並未削弱各國對軍事力量的依賴。1970年代以來全球軍費總額持續增加，即使在貿易持續攀升的背景下，各國軍事支出仍從1977年2,620億上升至2023年的2兆3870億美元(約新臺幣71兆6,100億，如圖二)。此一矛盾現象說明，國際和平無法單純依靠經濟互賴，軍事實力依然是大國確保秩序的重要後盾；而「美國治世」之所以出現，正是因為在推動自由貿易的同時，仍維持其壓倒性的軍事優勢，使其他國家均臣服於美國強大的軍事力量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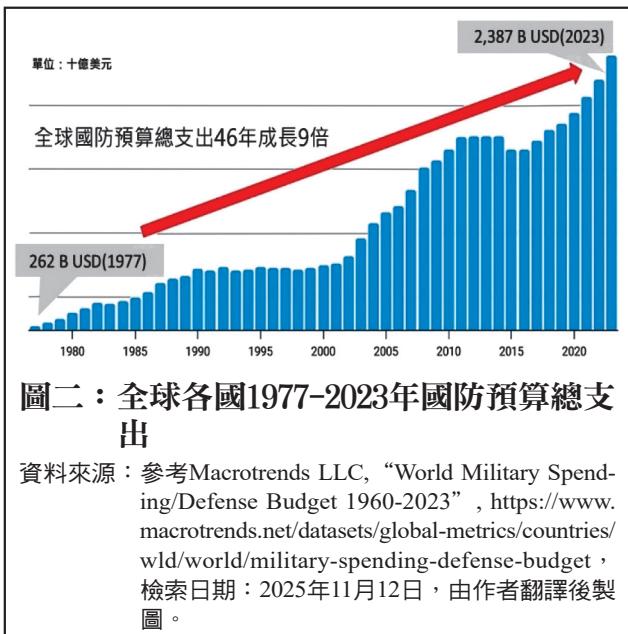
二、經濟互賴成為一種武器

(一)經濟互賴的一體兩面

註16：弗里曼認為兩個開設麥當勞的國家彼此不會開戰，人們將轉而追求意識形態目標，大麥克與薯條將取代戰爭的慾望。戴爾理論則認為兩個同地區處於戴爾電腦供應鏈，因為經濟的緣故不會彼此交戰。參考〈預防衝突的金色拱門理論〉，MBA智庫・百科，2020年5月27日，<https://wiki.mbalib.com/zh-tw/%E9%A2%84%E9%98%B2%E5%86%B2%E7%AA%81%E7%9A%84%E9%87%91%E8%89%B2%E6%8B%91%E9%97%A8%E7%90%86%E8%AE%BA>，檢索日期：2025年11月9日。

註17：同註3，頁67~72。

註18：Patrick E. Tyler, “U.S Strategy Calls For Insuring No Rivals Develop”, New York Times, March 8, 1992, <https://www.nytimes.com/1992/03/08/world/us-strategy-plan-calls-for-insuring-no-rivals-develop.html>，檢索日期：2025年11月8日。



貿易帶來和平的論述並非天經地義，「複雜互賴理論」認為唯有當互賴關係制度化、利益綑綁深入、衝突成本升高，貿易才可能產生制約的效果；¹⁹但頻繁的經濟交流，同時也被轉化為「武器」，成為優勢方的攻擊點以協助軍事行動。例如美國對伊朗、朝鮮的經濟制裁，及對中共的科技與經濟封鎖，還有「俄烏戰爭」中，透過掌控美元清算體系與制裁名單機制，聯合盟國凍結俄國中央銀行與國營機構資產，癱瘓其外匯運作與全球支付，充分展現金融霸權的戰略實力。²⁰反觀俄國在開

戰之初，以切斷天然氣供給來要脅歐洲不得參戰，也是經濟壓迫政治手段的體現；儘管事後觀察，雙方都未達成預定的目標，但確實在戰事初期發生部分威懾效果。

(二) 中共的經濟戰略武器化

中共的經濟戰略正體現經濟武器化的邏輯，畢竟在全球化體系下，「中」方既是互賴的受益者，同時也有意識地塑造互賴結構，使其成為隨時可動用的戰略資產。以下就政經、金融、資源、產業等四個構面展開分析，摘要如后：

1. 政經面：「一帶一路」與債務外交

中共透過「一帶一路」倡議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基建貸款，形成經濟依賴，如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Hambantota Port)即為典型案例，這種「債務陷阱外交」使得受援國的政治外交自主受到削弱，經濟互賴已被轉化為政治槓桿。²¹2025年天津「上合組織高峰會」上，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提出籌建「上合組織開發銀行」，表明其試圖以北京為中心，將經濟影響力擴展成制度性架構，以鞏固其在多邊治理體系中的主導地位。²²

2. 金融面：美元體系之外的籌碼

註19：同註2。

註20：Associated Press Fatima Hussein, “Yellen urges world leaders to ‘unlock’ frozen Russian Central Bank assets and send them to Ukraine”, AP News, February 27, 2024, <https://apnews.com/article/85e080fd78e9d37951e1e7dc58fdc87>，檢索日期：2025年11月12日。

註21：Kai Schultz, “Sri Lanka, Struggling With Debt, Hands a Major Port to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2, 2017,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0329171620/https://www.nytimes.com/2017/12/12/world/asia/sri-lanka-china-port.html>，檢索日期：2025年11月2日。

中共持有巨額美國國債，其目的一方面可維持人民幣(RMB)匯率與美元資產安全，一方面也具有潛在的金融槓桿作用；但更重要的是，「中」方積極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並發展跨境支付系統(如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進而削弱美元清算體系的制約力。此一策略屬於對「複雜互賴」的不對稱調整，除避免過度依賴不友善體系外，同時也增加其在地緣博弈中的迴旋空間。

3. 資源面：稀土與能源的戰略槓桿

中共已掌握全球「稀土」(rare-earth element)²³約七成以上的開採，以及高達九成的冶煉與加工。由於稀土是高科技與軍事工業不可或缺的原料；因此，成為北京手中最具影響力的戰略籌碼。2025年「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峰會期間，美、「中」領導人會晤後，「中」方旋即宣布暫緩對美國的稀土出口限制，顯示雙方正以關鍵資源為談判槓桿，在經貿互賴與戰略競合之間，展開新一輪的博弈。²⁴

4. 產業面：供應鏈嵌入的戰略效應

中共透過打造「紅色供應鏈」與國家補貼政策，在電子產品、電動車、電池等產業建立完整的生態系，這些關鍵產業的全球供應鏈高度依賴「中」方零組件與製造能量，即使在美、「中」科技戰背景下，西方企業仍難以完全脫鉤。此種「互賴陷阱」使得國際依賴中共的中間財或製造能力時，同時讓其在談判中就擁有議價與拖延的籌碼，這正是複雜互賴情境下「不對稱」的典型運用。²⁵

三、崛起者造成的權力失衡

(一) 單極世界的風險與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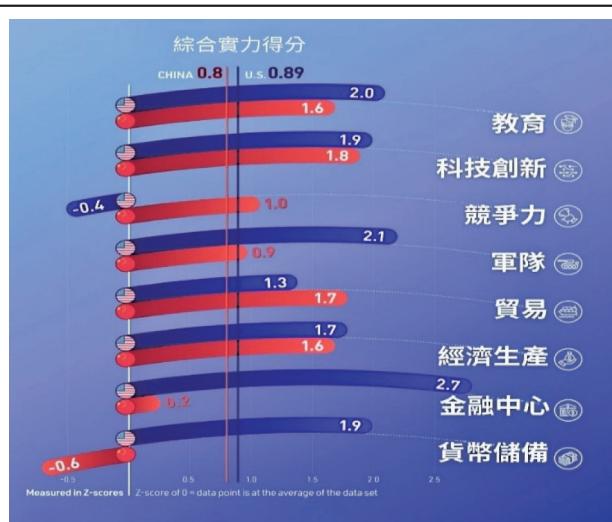
1. 2008年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讓世界驚覺在單極世界下，全球過度整合存在著巨大的系統性風險；尤其部分強權國家的金融監理制度鬆散，導致全球性的經濟災難，這是構思全球化戰略時未能顧及的。此次危機只是反全球化諸多警鐘之一，加上進入21世紀後，全球化一方面受到政治正當性的挑戰；另一方面，則籠罩著新東方強權在貿易與經濟各方面快速崛起的巨大陰影中(如圖三)。

註22：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加層峰(Summit)就是上合組織高峰會。Laurie Chen and Mei Mei Chu, “China’s Xi Pushes a New Global Order, Flanked by Leaders of Russia and India” Reuters, September 1,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chinas-xi-pushes-new-global-order-flanked-by-leaders-russia-india-2025-09-01/>，檢索日期：2025年11月8日。

註23：稀土是指由17種化學元素組成的金屬族群，廣泛應用於電動車馬達、風力發電機、手機與軍用雷達，是現代高科技與綠能產業不可或缺的關鍵材料。

註24：劉駢瑋，〈解析川習會：稀土管制延後、對中關稅降10%、未提臺議題……競爭格局仍在 可能重啟圍中〉，聯合新聞網，2025年11月5日，<https://udn.com/news/story/6839/9118721>，檢索日期：2025年11月12日。

註25：一方若在供應鏈、技術或資源掌控上具有更高替代門檻，即可在談判中擁有更大權力與操作空間。中共藉由掌握中間財、稀土與製造體系核心環節，形成對外部市場的「依賴鎖定」，正是此理論在當代產業戰略中的具體實踐。



圖三：2024年中共與美國實力評比圖

資料來源：參考Dorothy Neufeld, Joyce Ma, “Politics U.S. vs. China: Which Country is the World’s #1 Superpower?”, Visual Capitalist, September 26, 2024, <https://www.visualcapitalist.com/comparing-the-u-s-and-china-on-eight-measures-of-power/>，檢索日期：2025年11月11日，由作者翻譯製圖。

2. 中共的崛起並不僅專注於自給自足或原料出口，而是轉型成依賴原料進口及成品出口的工業強國，也讓其所處的地位類似英、德、日等國；這三國正是為爭奪原料和市場，導致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二十世紀前半葉的國際衝突，就是在工業化的西方國家接受美國領導及軍事優勢下化解的；但當下「中」方應不會願意接受美方的指揮與保護。²⁶觀察「中」方在世界經濟架構中的布建，及在美國金融市場

中「買保險」的動作(如大量購買美債)，就可以窺見其強烈意圖。

(二) 中共在經濟利益外的思考

中共一直以亞洲文明中心自居，昔日晚清受列強瓜分屈辱，並稱其為「百年國恥」；然此詞彙涉及兩層意義，其一是促使其致力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其二則藉此恢復「甲午戰爭」前的固有疆域。²⁷無論目的為何，中共都必須強盛到能應對外部干預，而這明顯與美國「說服潛在對手」的戰略相扞格；尤其當中共視我國為其「核心利益」時，行動就會脫離經濟常識，轉而以地緣與意識形態的勝負為最高優先，變成一場不以成本效益為邏輯的戰略競逐，對此國人應有所警惕。

肆、後全球化時代：亞洲經濟戰略局勢

全球化秩序長期基於經濟互賴可促進和平的假設，各國透過貿易與投資連結降低軍事衝突風險，並由霸權國家提供安全保證與制度規範。2025年1月，當川普總統重新執政後，推動無差別高額關稅政策，對包括盟友在內的亞洲國家廣泛加徵關稅，等同於推翻原有的自由貿易承諾，使

註26：詹姆斯·麥唐諾(James Macdonald)、洪慧芳譯，《大國的不安—為什麼經濟互相依賴不會帶來和平？為什麼多極化的世界非常危險？》(臺北市：如果出版社，2016年11月)，頁331。

註27：連雋偉，〈習提甲午戰爭，盼統一終結百年國恥〉，中時新聞網，2018年7月19日，<https://tw.news.yahoo.com/%E7%BF%92%E6%8F%90%E7%94%B2%E5%8D%88%E6%88%BC%E7%88%AD-%E7%9B%BC%E7%B5%B1-%E7%B5%82%E7%B5%90%E7%99%BE%E5%B9%B4%E5%9C%8B%E6%81%A5-215015348--finance.html>，檢索日期：2025年11月12日。

全球化的安全邏輯在亞洲地區、甚至全球範圍完全失效。²⁸當區域經濟體面對制度性保障流失、供應鏈失衡與戰略風險升高，全球即進入一個經濟與安全重構的過渡階段。以下就經濟架構再整合、供應鏈重整與軍經疊加等三個面向，分析後全球化時代亞洲的轉變與挑戰，說明如后：

一、亞洲經濟架構的再整合

(一) 後全球化下的亞洲新多邊關係

1. 在全球化浪潮帶動下，亞洲經濟迅速崛起，成為國際分工體系中的關鍵樞紐。為深化區域合作，各國積極推動多邊經貿架構。2022年生效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以下簡稱RCEP)，涵蓋15個亞太成員，預計20年內消除九成關稅，並建立數位貿易與智慧財產等統一規範。²⁹另外，由日本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以下簡稱CPTPP)，則是應對美國退出原「太平洋夥伴協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後的全新架構，並在2023年接納英國為成員；不過，日本政府強調將持續爭取美國重返，以確保亞太經貿秩序穩定。³⁰此兩大架構不僅重塑區域供應鏈，也展現出亞洲面對全球化裂解時，所具備的集體回應能力與制度韌性。

2. 2025年4月，川普政府積極推動的關稅政策，重創全球、尤其是亞洲的出口布局，削弱原有對美貿易的可預測性；與此同時，「天津上合會」登場，「中」、印、俄等國領導人齊聚，引發外界關注亞洲新興陣營的動向(如圖四)。儘管川普表示「似乎已失去印度與俄羅斯」，卻也凸顯美國在該地區影響力的流失；³¹此外，東北亞國家如韓、日、「中」則低調合作，試圖平衡美國政策的不確定性。³²上述發展顯示，美國體系在亞洲明顯發生動搖，而以中共、俄國為核心的經濟與安全架構已然成形。

二、供應鏈重整與東南亞的兩難

(一) 由美國主導重整的新全球化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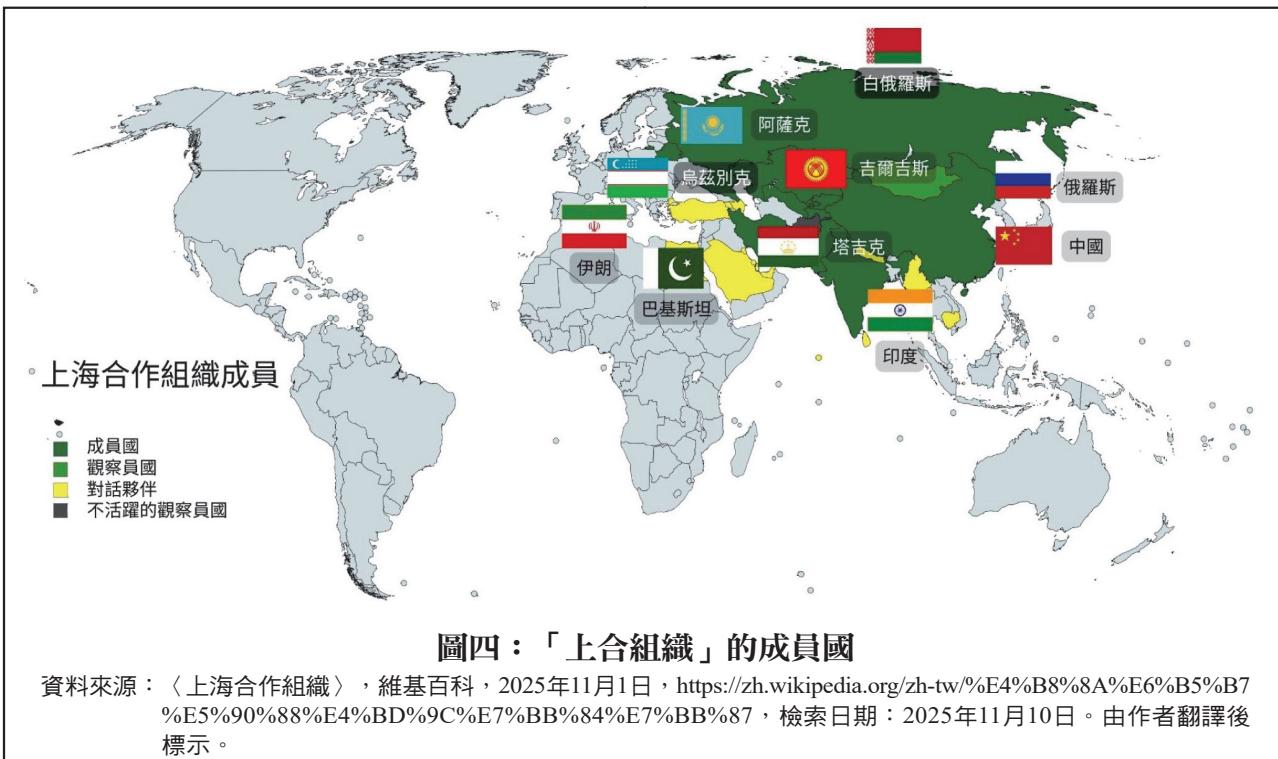
註28：徐建峰、曾宇平，〈核彈級關稅！川普震撼全球 產業影響、各界回應一次看〉，《工商時報》，2025年4月3日，<https://www.ctee.com.tw/news/20250403700440-430701>，檢索日期：2025年11月9日。

註29：吳宗錦，〈RCEP 2022元旦生效・中國與東盟搶互動先機〉，《華商世界雜誌》(澳門)，第52期，2022年1月6日，頁10~14。

註30：魏國金編譯，〈岸田文雄：美重返CPTPP至關重要〉，《自由時報》，2023年1月15日，<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562762>，檢索日期2025年11月9日。

註31：Donald Trump, “Trump Says India, Russia Appear ‘Lost’ to Deepest, Darkest China”，Reuters, September 7,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trump-says-india-russia-appear-lost-deepest-darkest-china-2025-09-05/>，檢索日期：2025年11月8日。

註32：Ming Gao, “Trump’s Return Drives Closer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East Asia Forum, January 4, 2025, <https://eastasiaforum.org/2025/06/04/trumps-return-drives-closer-cooperation-in-east-asia/>，檢索日期：2025年11月13日。



，目標是推倒中共所建立的經濟架構，主要現象就是供應鏈的地緣化。在美、「中」對抗加劇與「去風險化」政策推動下，跨國企業陸續將製造基地由中國大陸移往越南、印尼、印度與墨西哥等地。³³「中國加一」策略正改寫東亞多年來的區域分工模式，而這一波由中共主導的分工重組，遭美國認定有「洗產地」之嫌；尤當川普在2025年高舉關稅大旗時，越南、泰國等東南亞國便首當其衝，全球供應鏈則出現巨大的重整壓力。³⁴

(二) 東南亞國家許多本土企業並不具

備轉移出走的能力，在高關稅的現實下，未來出口美國將愈發不具優勢；在此背景下，關稅勢必對產業造成衝擊，而區域各國為挽救民生與就業，將不得不重新調整出口政策。特別是2025年提出籌建「上合組織開發銀行」後，若「中」方進一步將供應鏈重組與區域金融支持結合，東南亞國家將被更深度的吸納進「中、印、俄」為核心的經濟體系。換言之，放棄美國市場，轉向與中國大陸形成產銷一體化的經濟聯盟，不僅可能成為短期因應之道，也可能在「上合會」制度加持下，逐漸成為

註33：〈美歐對華政策：從「脫鉤」到「去風險」 戰略轉向還是凝聚共識？〉，BBC NEWS中文，2023年7月6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66117744>，檢索日期：2025年11月13日。

註34：陳苓編譯，〈美國打擊「中國加一」戰略，東南亞洗產地在劫難逃〉，《經濟日報》，2025年4月3日，<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599/8652273>，檢索日期：2025年11月10日。

新興區域秩序的制度性選項。

(三)在衡量關稅與製造成本後，亞洲部分具實力的企業，將選擇至美國設廠，短期間供應鏈轉移成本將引起商品價格波動。此外，關鍵原料、技術也同時牽動各國在國安、外交與軍事上的戰略調整。以「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以下簡稱台積電)為例，美國財長貝森特(Scott Kenneth Homer Bessent)就點名該公司是國安風險。³⁵面對全球化重整過程中，政府將主動介入企業布局，並將「產業安全」納入國家安全戰略中，而這些措施已然加速貿易全球化的崩解。

三、經濟與軍事邏輯的重疊風險

(一)軍事衝突下的經濟風險

1. 「俄烏戰爭」造成歐洲能源、糧食價格上漲，使全球供應鏈管理加入更多軍事風險考量；且在2020年「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期间，工業大國就注意到晶片供給的問題。目前全球仍有九成以上的先進晶片在我國製造，而臺海一直是國際預測的戰爭熱點，從而讓敏感的地緣戰略位置成為「矽盾」(Silicon Shield)。

正因為我國不只是區域安全關鍵，更是全球經濟「風險」的一環；這也促使美、日、德等國更積極的推動晶片產能「去臺化」與本地化建廠，³⁶意圖建立更安全的供應鏈，以降低經濟發展的外部風險。

2. 再者，由於南海航道每日承載全球三分之一的貿易貨運，³⁷任何軍事摩擦都可能導致全球油價飆升與物流中斷。美軍長期主張「自由航行」(Freedom of Navigation)，並不斷透過「自由航行行動」(FONOPs)挑戰中共伸張的南海主權，³⁸這讓雙方在該區域的軍事巡弋次數逐年增加，航艦與軍機的對峙頻率已是「冷戰」後的新高點。換言之，中共「藍水海軍」實力快速擴增，已與南亞諸國不斷發生海上紛爭，皆透露出此貿易航道產生的經濟風險始終存在。

(二)霸權退場後亞洲國家的應對策略

1. 當前美國一方面對亞洲盟友經濟施壓，一方面又無法在安全上做出過多保障，尤其在中共「福建號」(舷號18)航艦成軍後，更凸顯此一風險之嚴峻，³⁹於是區域內多數國家便開始推動「戰略自主」策

註35：〈美財長點名「台積電是國安風險」！貝森特：台積電主導晶片生產，對美國安全不利〉，風傳媒，2025年8月28日，<https://tier.psee.io/88d98w>，檢索日期：2025年11月10日。

註36：崔慈悌，〈9成以上高階晶片集中在臺生產 李淳：不符經營邏輯〉，中時新聞網，2024年3月4日，<https://tier.psee.io/7xm4tn>，檢索日期：2025年11月13日。

註37：Nik Martin，“How South China Sea Tensions Threaten Global Trade”，DW News, August 25, 2024, <https://www.dw.com/en/south-china-sea-tensions-pose-threat-to-international-trade/a-69926497>，檢索日期：2025年11月6日。

註38：Commander, U.S. 7th Fleet Public Affairs, “U.S. Navy Destroyer Conducts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United States Navy, May 10, 2024, <https://www.navy.mil/Press-Office/News-Stories/Article/3771407/us-navy-destroyer-conducts-freedom-of-navigation-operation-in-the-south-china-s/>，檢索日期：2025年11月6日。

略，其中日本在新任首相高市早苗領導下，宣布將提前實現防衛經費占「國民生產毛額」(GDP)百分之二的目標，並強化與英、美的軍工合作。⁴⁰此外，南韓總統李在明也宣布，2026年國防預算將提升百分之八以上(8.2%)，達66.3兆韓圓(約新臺幣1.9兆元)，並規劃至2030年躍升為全球第四大國防產業強國，顯示其在軍事自主與出口擴張上的決心。⁴¹

2. 亞洲各國擴充軍備下，印尼與印度也相繼提升國內軍事工業，試圖減少對西方軍火的依賴，此正反映過去依靠全球化所打造的安全緩衝與經濟互賴，已無法支撐未來的戰略穩定，並讓亞洲秩序處在一個過渡時期，各國一方面積極搶占新的經濟高地；另一方面，卻處於戰略不確定性與潛在衝突驟增的風險中。這現況意味著，若無法建構新的區域協調與風險管理架構，亞洲將可能成為「新冷戰」邏輯下的最前線。

回顧中共在2025年「上合會」中，提出籌設銀行以深化區域制度整合，亦顯示

「中」方正積極地塑造新的區域治理框架；加上北京舉行史上最大的「九三閱兵」，並刻意與俄羅斯、北韓領導人同場亮相，似乎正宣示著新的區域安全架構已然成形。⁴²

伍、去全球化浪潮中我國的產業戰略

面對全球化崩解與地緣對抗升溫，我國這座科技矽島正處在戰略的關鍵位置，畢竟臺灣所處的地位既是機會，也是壓力；縱觀近代歷史，政治、貿易、軍事如此緊密重疊，相互影響的例子並不多見。當前我國與中共在軍事實力上，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我國目前在政治、貿易上，仍具有部分優勢。如何在有限的籌碼中，運用全球局勢的變化，進一步強化自身安全與國際價值，確實值得思考。以下就我國在區域國際關係及相關產業後續發展建議，說明如后：

一、我國在亞洲的國際關係

(一) 在當前亞洲區域經濟整合網絡中

註39：宋玉寧，〈大陸福建號航艦成軍 黃介正揭「戰略部署」〉，中天新聞網，2025年11月9日，<https://www.ctinews.com/news/items/4bnbKE6ZWP>，檢索日期：2025年11月13日。

註40：Mari Yamaguchi, “Japan’s new leader vows to further boost defence spending as regional tensions rise”, Associated Press, October 25,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japan-takaichi-politics-policy-defense-4b885276a0052297ab633bac31715254>，檢索日期：2025年11月8日。

註41：Joyce Lee, “South Korea aims to become world’s 4th-largest defence power by 2030, President Lee says”, Reuters, October 20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south-korea-seeks-become-4th-largest-global-defence-power-president-lee-says-2025-10-20/>，檢索日期：2025年11月8日。

註42：Charles Hutzler, “China Shows Unity With Russia and North Korea but Divisions Ling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7, 2025, <https://www.wsj.com/world/china-shows-unity-with-russia-and-north-korea-but-divisions-linger-d37be3a2>，檢索日期：2025年11月13日。

，我國的角色顯得格外特殊而邊緣，一方面我國擁有先進的科技實力與完整的高階製造供應鏈，特別是在半導體產業中處於全球關鍵地位；另外，在政治上長期受到「中」方外交與政治打壓，以致無法參與如RCEP或「中」、日、韓FTA(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等多邊貿易協定。如今川普總統重新執政，實際情況則更加嚴峻，面對結構性的排擠，我政府勢必得另闢蹊徑，才能突破邊緣化的現狀。

(二)我國在「雙邊深化」的路線上，正積極與美國、歐盟、日本等民主國家洽談更緊密的經貿與科技合作，例如「臺美21世紀貿易倡議」(U.S.-Taiwan Initiative on 21st Century Trade)，以及與歐盟在半導體、潔淨能源等領域的戰略對話。⁴³其次，我國也試圖與區域內具地緣政治互補性的國家建立產業聯盟，如赴日本設立晶片廠，以幫助分散生產風險；⁴⁴儘管如此，亞洲國家對臺貿易互賴，恐不足以溢至安全保障上，仍需持續加強產業相互嵌入的緊密程度，才能讓產業互賴真正轉化為區域穩定的力量。

二、強化多邊產業嵌入戰略

(一)在全球化裂解與供應鏈重組的背

景下，我國正處於高度危險的戰略夾縫中。與此同時，美國卻面臨區域衝突頻仍、全球資源重分配、製造業回流壓力及國內孤立主義氛圍上升等挑戰，導致在全球的安全承諾變得相對脆弱。在此局勢下，我國必須從經濟與產業面思考替代性的安全機制，如先進晶片製程、封裝測試、材料供應到設備整合，這不只是經濟成就，更是一項可用的安全籌碼。當各國越依賴先進晶片，我國的產業命脈也將被視為他國自身經濟與安全的命脈；因此，將這項「產業性依賴」進一步升級為「全球共構」，從而建立制度性、結構化的戰略嚇阻力，也是政府責無旁貸的使命。

(二)推動產業「多邊嵌入」策略，意在讓美、日、德等科技企業直接參與我國關鍵產業、從單純供應商轉為利害關係人。以美商「輝達公司」(Nvidia Corporation)與「鴻海科技集團」(Foxconn)2025年合作建置AI智慧工廠為例，便象徵外國企業將其營運命脈深度部署於我國。⁴⁵透過此機制，一旦出現來自外部攻擊或封鎖，不僅是針對我國，更構成對相關國家「實質」經濟利益的侵害。此外，我國政府應構建數位與研發制度合作平台，如設立

註43：〈臺美21世紀貿易倡議首批協定正式生效，臺美攜手深化經貿合作，共創里程碑〉，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2024年12月10日，<https://www.ey.gov.tw/otn/D4BECA8C62559293/dcfcf6e52-7248-40a1-a5ef-2af373afecd5>，檢索日期：2025年11月13日。

註44：林韋伶，〈台積電是頂尖車手 但要全球協力！熊本廠對日本多重要？「臺日半導體同盟」能做啥〉，聯合新聞網，2025年10月20日，<https://udn.com/news/story/6839/9081573>，檢索日期：2025年11月9日。

註45：蕭君暉，〈鴻海砸420億建 AI 超級算力中心 聯手輝達打造臺灣最強「AI Factory」〉，《經濟日報》，2025年10月28日，<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9100023>，檢索日期：2025年11月13日。

資料中心與聯合研發實驗場域，促使外國企業的營運命脈在臺佈建，從而將任何針對我國之行動，均將視為對盟國產業鏈與國安結構的正面衝撞。

三、軍貿共構打造真正的安全聯盟

(一)借鑑「俄烏戰爭」與中共戰略崛起已昭示，若一國決心重塑區域秩序時，經濟利益就必須讓位於地緣目標。若我國冀望在地緣風險中維持和平，光靠產業嵌入是不夠的，必須進一步與軍事融合，也就是不僅具備足夠的國防力量，更是要將自身科技、產能、制度優勢，轉化為民主聯盟軍事體系的一環。畢竟產業供應鏈相互依賴，頂多只能延緩衝突；但若我國的晶片、材料、衛星零件技術能直接嵌入在盟國的作戰體系、指揮設備與後勤補給鏈中，那麼任何對臺的攻擊行動便是對整個民主聯盟運作基礎發動挑釁。此種結構性「合成效益」將能真正提高戰略嚇阻的效果。⁴⁶

(二)我國政府應把握日、韓、澳及歐洲積極強化防務的契機，將科技產業有系統地導入民主陣營的國防體系，藉此將我國的科技優勢轉化為區域安全資產。具體而言，可採「區域防務協作」與「技術信任網絡」雙軌布局，前者透過與日、韓、

澳洲等國建立「防務產業夥伴機制」，再透過舉辦「印太防務產業論壇」，促進無人機、資安防護及衛星通訊等軍民共用技術的分工合作；由政府主導設立「防務科技信任特區」，由經濟部與數位發展部主導，提供軍規晶片與AI模型的驗證服務，並制定與盟國相容的資料安全與供應鏈稽核標準。此種「軍貿共構」的合作架構，不僅能提升我國在防務科技體系中的信任地位，也可讓科技產業成為國家戰略防衛的一環，讓產業互賴進一步升級為民主陣營間的制度性安全保障。

四、增強戰略認知與行動準備

(一)當全球化體系走向裂解、供應鏈重組的艱難此刻，第一線面對危機的國軍部隊同樣受到衝擊。故無論是與外國企業深度嵌合的「多邊產業嵌入戰略」，或是我國產業與盟國軍力結構連結的「軍貿共構戰略」，其目的，都是期望提升我國的地緣戰略價值，讓全球利益網路無法承受臺灣本土遭到武力的攻擊。從軍事角度來說，政府成功的產業策略將帶來部分安全「外溢效應」，分述如后：

1. 「有援、有聯、有價值」

透過多邊產業嵌入的有效運作，我方可預期在第一時間內獲得較多國際政治與

註46：「合成效益」發想自醫學名詞「合成致死」(Synthetic Lethality)，係描述兩種基因突變本身都是無害的，但當它們在同一個生物體或細胞中結合在一起時就會致命。借鑑到國家安全視角，意指當貿易與軍事各別行動時，無法確保國家安全，但結合再一起則可。Sebastian MB Nijman, “Synthetic lethality: General principles, utility and detection using genetic screens in human cells”, FEBS Letters, Vol.12, No.1, January 3, 2011, pp.1~6, <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3018572/>，檢索日期：2025年11月12日。

企業界聲援；但這並不等於實質的軍事支援，國軍仍需在戰場上遲滯敵軍、爭取時間與空間，方有利確保外部的協助能及時介入。國軍存在的價值，不只是國土防衛的延伸，更是國際政治斡旋與產業輿論發酵的延長；因此，平時即應強化持久戰訓練、通信與網路備援、分散部署等能力，以爭取戰場上寶貴的「機會之窗」。

2. 「半援、半聯、有限支撐」

若「軍貿共構」戰略得以實現，我國將不再只是地理要地，而是盟國軍事產業鏈中的「供應環節」；屆時我方可能會被對手視為「前端軍事生產基地」或「聯盟網路核心」，而非單純目標。換言之，國軍不僅要防衛領土，更要有「護衛體系資產」的思維，並藉由持續戰力強化，以保護本島的聯盟軍工設施、港口備援資源與關鍵物資輸出船隊。故國軍應同步加強培養周全、轉移、轉運的複合應變能力，以應對產業與軍事一體化的防衛需求。

(二) 儘管我國有部分科技產業與國際合作，但卻未能納入盟國軍貿體系中，自然無法成為國際產業體系中的關鍵樞紐，這意味著不能期待外部支援或聯盟正當性的保護。在此態勢下，國軍本就必須依靠自身有限戰力「孤立自守、自力防衛」；故採縱深防禦延緩敵軍攻勢、透過分散部

署與後勤韌性，維持有生戰力，俾在不利條件下爭取最大斡旋空間，當是國軍官兵應有之決心與共識。我國今(115)年度國防預算達9,495億新臺幣、GDP占比逾百分之三(3.32%，年增百分之22.9)，並規劃於後續年度持續提高相關預算配置，⁴⁷正是政府強化國防能量、增強自我防衛決心的展現。

(三) 面對可能的「半援」或「孤立自守」局勢，國防預算的用途不應只是購買武器，而是應該打造本地軍工科技的產業戰略縱深，特別是無人機、資通訊韌性等領域，這些正是國際軍貿體系最重視的核心能力。透過與國內半導體、通訊、資安、航太等產業的深度整合，不只可快速提升自主研發與量產能力，也能讓我国高科技產業成為盟國不可或缺的安全節點，進而提高國際合作意願與軍貿互信空間。

咸信無論未來我國安全環境如何，對國軍而言，落實戰備訓練、加強作戰與動員計畫演練，仍係首要任務；另方面，積極配合政府在產業、外交與軍事體系同步運作，方能在不確定的國際環境中，維持國家安全與戰略自主。

陸、結語

正當全球化體系逐步崩解，地緣經濟

註47：賴于榛、高華謙，〈明年總預算案挹注地方增4165億 國防經費9495億創新高〉，中央通訊社，2025年8月21日，<https://www.cna.com.tw/news/aip1/202508210204.aspx?>，檢索日期：2025年11月10日；翟思嘉，〈8年投入1.25兆國防特別預算 顧立雄：強化攔截、無人化7大關鍵目標〉，中央通訊社，2025年11月26日，<https://www.cna.com.tw/news/aip1/202511260136.aspx>，檢索日期：2025年12月20日。

正重塑權力格局，我國也面臨風險與契機並存的關鍵時刻，美、「中」對抗不僅改變全球供應鏈布局，更將經濟依賴轉化為戰略壓力；然此同時，我國在半導體與高科技產業上的優勢，亦讓我國成為全球不可或缺的生產節點。這種矛盾形勢意味著，後全球化時代的我國，既可能因國際體系的不穩定而承受威脅，也能藉由產業嵌入與軍貿共構策略，將地緣風險轉化為戰略資產；唯有在政治、經濟與軍事的多軸思維下，國家才能從既定的邊陲位置，升格為區域安全不可或缺的樞紐。

國防必須呼應經濟戰略，並與同盟形成緊密連結，才能確保國家安全與制度韌性。未來的防衛不再侷限疆域領土，更須涵蓋產業鏈保護、軍工設施維護與盟國間

的利益共享。當國軍的存在價值，在於爭取時間與空間，使外部支援得以適時介入，並確保我國在多邊架構中的戰略價值持續有效；這意味著我國國防應以持久戰為核心，強化分散部署、通信備援與資源動員能力，並將科技與產業優勢轉化為整體防衛的一環。當前唯有我國的安全被視為全球供應鏈與自由秩序的共同利益時，才能真正建構起足以維繫和平的結構性嚇阻力，確保國家長治久安與蓬勃發展。 

作者簡介：

鄧翔靖先生，海軍備役士官長，指職士官班第四期、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碩士107年班、博士111年班，曾任海軍司令部督察長室、《海軍學術雙月刊》編輯，現為臺灣經濟研究院國家經濟戰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